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 刘海涛 周 川

摘要: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大致分为清末时期、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研究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分析安徽清末、北京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安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发现,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具有起步早、起点高、但发展屡次中断、受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干扰强烈,高等教育发展没有根植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等特点。因此,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要跟政治保持适当距离,避免过度政治化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的剧烈波动;同时,高等教育要主动深入社会实践,在服务社会发展中发展自己,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本土高等教育理论。

关键词: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史;求是学堂;省立安徽大学;国立安徽大学;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717(2016)02-0092-07

收稿日期: 2015-04-03

基金项目: 安徽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江淮分水岭区域文化特点研究”(SK2016A066);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皖江地区古代书院文化研究”(AHSK11-12D220);滁州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安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2015qd38)。

作者简介: 刘海涛(1974-),男,安徽潜山人,教育学博士,滁州学院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研究;周川(1957-),苏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明清时期,安徽高等教育十分发达。明朝和清朝初期,安徽跟江苏、上海合称“江南省”。每期科考,江南省的上榜人数占了全国的近一半,有“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的美誉^[1]。清代顺治三年(1646)至清光绪三年(1877)前后230年,科举考试98榜,安徽共

录取进士1 142名,其中一甲状元9人,一甲二名榜眼7人,一甲三名探花4人,位列全国各省第三^[2]。清朝徽州府所属6县共录取进士516人,其中状元17人,以府计,仅次于苏州府的24人,居全国第二。在徽州府的17名状元中,休宁县为13人,若以县计,则远过吴县的4人,位列全国第一^[3]。但安徽省进入近代以后发展日益缓慢,到1947年,安徽高校数和大学生数分别占全国的1.45%和1.5%,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P642)}。探寻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对于全面了解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面貌,促进当代省域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一、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概述

自1898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将安徽省学敬敷书院改为官办求是学堂(标志安徽进入近代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败亡,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

(一)清末发展阶段

从1898年安徽求是学堂成立并招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安庆随后爆发独立革命,安徽省高等学堂全部停办,安徽高等教育中断),此阶段为清末安徽高等教育阶段。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是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继续失利,西洋诸国庞大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使闭关锁国的清朝举国震惊,认识到中外技术的差距。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洋务派开展“自强运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轮船、枪炮制作技术,试图建立现代工业、现代交通、通讯业,并创办一系列新式专科学校——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开始向现代转型。安徽巡抚邓华熙^①(其出生地广东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地区)是清末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的同乡,跟康梁交往密切,在清政府中属于维新改革派官僚。1896年,邓华熙担任

安徽巡抚后,跟当时芜湖道袁昶一起率先对安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公共事务等进行一系列改革,使安徽在当时全国各省改革中走在前列。1897年,邓华熙上奏政府,指出要学习西学必须废除原有的书院,设立新式学堂:“今之讲求实学,必须实事求是。但于旧有书院令其兼习,究虞造就难成。应请各省均于省城另设学堂,学生自十三岁至十五岁止,择其读过经书,略通文理、姿性聪颖,体质结实、身家清白者,核实考选,入堂肄业。”^[5]经清政府同意,1898年6月求是学堂正式开办。戊戌政变后,安徽求是学堂因已经办出成效,没有被关闭。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宣布重新启动新政,下兴学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6]1902年4月,安徽巡抚王之春按照要求改求是学堂为安徽大学堂。1904年1月,清廷颁布实行《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各省市将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安徽于当年4月改安徽大学堂为安徽高等学堂。1906年,巡抚恩铭聘请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担任学堂监督(校长)。严复按照当时高等学堂的惯例整顿学堂,设置预科和师范科,强调外语教学和算学,大大提升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声誉。到1911年止,安徽共建设了高等学堂和各专业学堂9所(见表1)。

据1909年第一次教育年鉴统计,安徽1909年有

专门学堂7所,仅次于直隶(18所)、四川(10所)、江宁(9所),和江苏、湖南并列第4位;学生总数为1 144人,仅次于直隶(4 028人)、四川(1 511人)、河南(1 373人)、广东(1 339人)、江苏(1 182人),位列第6名^[7]。安徽高等学堂开办本科时间和坚持时间都处全国前列^[8]。

(二) 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11年,安徽安庆紧跟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受混乱的政治影响,高等学堂全部停办。1912年6月,安徽绅士刘希平、光明甫、程滨遗等筹资创办私立江淮大学,接收原安徽省立法政学堂、安徽公立法政学堂和安徽私立法政学堂的学生,同时接收安徽高等农业学堂和安徽高等学堂失学青年。江淮大学分文法两院,其中法学院设政治、经济、法律3系。当时有学生千人以上,规模较大。但学校系仓促成立,接收的又是各关闭学堂的失学青年,存在入学资格不一、教学管理混乱、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等情况。1915年,安徽私立江淮大学在教育部督学的建议下,改为由教育部注册、省政府拨款的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自1916年首批本科生毕业,到1926年该校共培养10届本科毕业生。1926年,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因发生学潮被军阀取缔,校舍成为战地医院,安徽高等教育再次中断。

表1 安徽清末创办高等学校概况表

	创办人	创办时间	学制	人数	办学经费
安徽求是学堂	皖抚邓华熙	1898	大学预科	300	创办经费20 000两,运行经费每年8 000两
安徽大学堂	皖抚王之春	1902	大学预科	100	安徽布政使司拨款、学费
安徽高等学堂	皖抚王之春	1903—1911	大学预科,本科	100—300	创办经费银60 000两,年运行经费银60 000两
安徽省师范学堂	皖抚恩铭	1906—1911	大学预科、选科	272	创办经费银20 000两
安徽省官立法政学堂	皖抚恩铭	1906—1911	选科、讲习科	765	安徽布政使司拨款、学费
安徽省公立法政学堂	李国栋	1908—1911	学制8个月		安徽布政使司拨款、学费
安徽省私立法政专门学堂	程晓苏、光明甫	1911	选科、讲习科		私人募集经费
安徽武备学堂	皖抚邓华熙	1902—1906	高等专科		藩司拨给经费
安徽高等巡警学堂	皖抚恩铭	1906—1909	高等专科	147	藩司拨给经费
安徽省立存古学堂	藩司沈曾植	1905—1911	大学预科		藩司拨给经费
安徽高等农业学堂	刘梧冈、程滨遗	1910—1911	本科、讲习科		刘氏八都湖公股龙洋4 000元、粤汉铁路股票4 000元、钱庄借款8 000元、现款6 000元

①邓华熙(1826—1916),字筱赤,广东顺德人,清咸丰辛亥科举人,历任云南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安徽巡抚、山西巡抚、贵州巡抚,1902年因病辞归。见章开沅.辛亥革命辞典·增订配图本[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77.

此阶段,安徽试图创办综合性大学:安徽大学。从1921年开始筹办,到1928年正式开学前,近8年时间里安徽曾3次组建安徽大学期成会、安徽大学筹备会、安徽大学筹委会,但由于经费、政治动荡、人员更替频繁等原因,学校始终没有建立起来^[9]。

这一时期,安徽高等教育陷入低谷,学生数、办学经费额、高校数等都居于全国末位。1923年,全国各省份专门以上学校校数及学生数表显示,安徽省以171名大学生、每校均生89.5人排名全国倒数第2名(除去热河、绥远、察哈尔和新疆没有统计数据)^[10]。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安徽大的政局亦开始稳定。同年,省立安徽大学^②成立。省立安徽大学筹备时计划开设文、理、法、工、农5个学院,第一期先开设文、法、农、工4个学院。但筹备之初即不顺利,除了刘文典负责的文学院筹备按时结束、顺利招生外,法学院招生人数不够,工学院只招录合格新生3名,其余均没有开办起来,最后合并成文法学院。当时,学校暂未设校长,由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刘文典代理校长职权。由于生源质量较差,第一学期只招收预科,第二年才招到合格本科新生131名。1928年底,安徽大学发生学潮,刘文典因处理不当冲撞蒋介石被免,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兼任校长。程天放创办了理学院,并把文法学院拆解为文学院和法学院。至此,省立安徽大学符合了教育部“有三个学院才能称为大学”的规定,真正建立起来了。1935年,教育部裁撤国内包括安徽大学在内的大部分高校的法学院。同年,安徽大学开始筹建农学院。到1937年底,安徽大学建成为包括文、理、农三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获得10.24万亩学田的资助,在校生在300~400名之间波动。经过10年的发展,省立安徽大学已经获得较好的发展。但因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安庆1938年被占领,安徽省政府于1939年关闭安徽大学。至此,安徽高等教育再一次中断。

1940年,随着战局日趋稳定,安徽省政府决定筹建安徽建设学院,并成立安徽建设学院筹备委员会。随后,教育部颁布《游击区及接近前线各省

市设立临时政治学院办法》,要求各有沦陷区的省份设立临时政治学院。于是筹备中的安徽建设学院改为安徽临时政治学院,于1941年10月正式成立并招生,一年后改为安徽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3年9月,该校扩建为安徽学院,并于皖南休宁县设立皖南分院,到1947年底有学生900人。

1946年,教育部决定恢复中断的安徽大学,并升格为国立,定名“国立安徽大学”,设立文、理、法、农4个学院12个系。到1947年底,该校有本科生1227人^{[11](P642)}。

1947年9月,安徽省政府将位于蚌埠的省立蚌埠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迁到淮南,升级为省立工业专科学校,设置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电机工程三科,有教职工57人、学生431人。到1949年,安徽共有高等学校三所,在校学生2502人,分别占全国的1.45~1.5%,远远低于全国的省均水平^{[4](P642)}。

二、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一)起步早,起点高,但屡次中断,发展迟缓

安徽新式高等教育筹备于1897年,开办于1898年春,比“百日维新”关于兴办新式学堂的教育改革命令颁布还要早几个月,比清政府下令在全国普遍设立新式学堂早4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在奏折中指出:“现议经济岁科,专就学堂录送;而各省学堂,除直隶、湖南、安徽等省外,尚未推行。”^[11]可见,至少在1898年戊戌新政时,安徽高等教育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在随后的几年里,安徽一直紧跟全国高等教育的步伐。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宣布重新启动新政,下兴学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6](P1293)}半年后的1902年4月,安徽巡抚王之春按照要求改求是学堂为安徽大学堂。1904年1月,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要求京师设立大学堂,其余省市将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安徽及时跟上,于4月改为安徽高等学堂。1909年安徽高等学堂裁撤预科,开办本科,这在各省学堂中也不算比较早的^{[8](P13-14)}。

^②此校1928年刚开班时定校名为安徽大学,1929年安徽省政府定名为省立安徽大学,后教育部确定名称为安徽省立安徽大学,习惯称为省立安徽大学,以便和1946年成立的国立安徽大学相区别。

安徽高等学堂办理起点算是较高的。面对西方先进文化,邓华熙不像大多数守旧官员一样机械理解“中体西用”原则主张改造旧有书院,他主张直接从西式学堂入手,认为“旧有书院令其兼习,究虞造就难成”,显示其对传统书院局限的理解和对西学的期望。他开始奏办的不是中学堂,而是直接创办二等学堂,其目的就是为给京津头等学堂供应优质生源。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设计,二等学堂也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安徽求是学堂建立后,顺应社会发展,先后演化为安徽大学堂和安徽高等学堂。1906年,巡抚恩铭聘请具有在英国留学多年,在学术界知名度极高的严复任监督。严复大胆改造学堂,提出以外语和算学为中心的课程改革,真正抓住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突破的核心,并于1909年顺利开办高等本科教育。安徽高起点创办高等学堂,为安徽省和全国造就了众多国之精英,例如民国著名政治家柏文蔚,历任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和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的王星拱教授,为安徽近代公路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刘贻燕教授、程振钧教授等。值得一提的是,随后很多年,甚至到1924年安徽省筹办安徽大学时,省内还有众多教育界人士认为安徽没有设立大学的基础和需要,反对设立安徽大学,主张先建设中学。

虽然安徽高等教育开办早、起点高,但其后却发展非常不顺。从1898年建立求是学堂开始,安徽高等教育经历了3次中断。

第一次中断是1911年安庆独立时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形势迅速影响到安徽。安庆革命党人吴旻谷、韩衍、管鹏等推举讲武堂教官胡万泰为总指挥,准备发动起义,安庆巡抚朱家宝则积极准备抵抗。此时改良派安徽谘议局居中调停,朱家宝宣布独立,任正都督,革命党人王天培任副都督。但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安庆独立不久,朱家宝和王天培矛盾激化,王天培失去副都督之职,安庆被朱家宝控制。革命党人吴旻谷赴九江请求援兵,导致九江地方军阀浚军进入安庆发生兵变,士兵大肆抢劫商铺及居民达一周之久。安庆城内包括高等学堂、法政学堂、师范学堂在内的所有学堂为躲避战祸全部关闭,安徽高等教育因此中断。

第二次中断发生在1926年,安徽军阀陈调元关闭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简称法专)。这所学校由安徽私立江淮大学发展而来,由国民党左派人士

光明甫、刘希平等创办,富有革命传统。1921年,校长光明甫带领学生争取教育经费时,发生了军阀马联甲殴打学生致2名学生死亡的“六二惨案”。该校随即爆发了“六二学潮”,要求惩办杀人凶手、保障教育经费独立。经过一年多抗争,该校终于取得胜利,办学经费从70万增加到150万。在随后驱逐军阀控制的省长李兆珍运动中,光明甫和法专均起领导作用。1926年1月,中国共产党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支部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任命光明甫、朱蕴山、周松圃等9人成立国民党(左派)安徽省临时省党部,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拒绝承认。法专学生在光明甫以及中共法专党支部的领导下发动学潮,游行示威。10月,安徽省主席兼警备司令、军阀陈调元下令镇压学潮,查封了法政专门学校,通缉捉拿光明甫。至此,安徽高等教育再次中断。直到1928年4月安徽大学成立,安徽高等教育才开始恢复。

安徽高等教育第三次中断发生在1939年至1941年,日寇占领安庆时期。1936年10月,湖北省长杨永泰遇刺身亡,安徽省长刘镇华受此刺激精神失常无法处理政务,于1937年5月被免职。期间,日本逐步进逼中国,并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受省政府直接管理的安徽大学由于省政府瘫痪无人过问,安徽省教育厅跟安徽大学关系一直不顺,安徽大学校长李顺卿面对危机,既没有做好大学内迁的准备预案,也没有筹措到必要的搬迁经费。到1938年日本进逼安庆时,省教育厅制定《安徽大学非常时期保管办法》6条,核心条款如下:“一、安徽大学因受抗战影响,校务不能继续维持时期适用本办法。二、保管期间,由省政府委派保管员二人,一负责保管安庆校产,一负责保管运出省外资产。”其核心思想是保存校产而不是学校内迁。当日本攻占安庆时,校长李顺卿以到重庆教育部寻找资金为由离开安徽大学,滞留重庆不归,代理校长、生物学院院长汪洪法带领安徽大学部分师生先后撤到安徽金寨、湖北沙市等地方。1939年,在安徽省教育厅的建议下,安徽大学被解散。本来发展良好的安徽高等教育再一次夭折。

(二) 受经济制约较大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除清未经费尚能保证外,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高等教育受到经济制约极大。从现存史料可以看出,清末安徽举办高等教育经费都从政府财政经费支出,并

无拖欠的记录。到1912年北洋政府主政开始,安徽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渐严重不足。军阀倪嗣冲1913年8月开始统治安徽,9月就下令停办教学成绩显著的徽州第五师范学校,将教育经费移办团练^[12]。随后他于1914年命令“全省中小学停办一年”^{[13](P371)};1916年5月11日,他又下令凡用公款办学的学校一律停止,其款项移作办理团防^{[13](P376)}。1918年5月,倪嗣冲申请北京国民政府增拨军费30万元未果,遂将全省教育、行政经费挪作军费,导致全省4月份以来停拨教育、行政经费^{[13](P383)}。1920年,倪嗣冲竟将全省结余的77万元教育经费,纳入私囊。^③倪嗣冲几次三番将教育经费挪作军费,除去其鄙视新教育、政治保守以外,安徽经济疲敝、财政异常困难也是直接原因。1921年,蔡晓舟等人发起成立“安徽大学期成会”开始筹备创建安徽大学^[14],并在省长许世英和教育厅长杨乃康支持下于1922年成立安徽大学筹备处,后因筹办经费从中小学经费中切割,遭到中小学界强烈反对而作罢^[15]。1923年,江焯出任省教育厅厅长,计划将安徽大学筹备经费从国税项目下支付,并成立安徽大学工科筹备组。但江焯本人找军阀吕调元索要拖欠的教师薪金时,因遭军阀吕调元殴打愤而辞职,致使安徽大学筹备再次中止。1924年8月,教育厅长卢殿虎重拾筹办安徽大学事宜,和财政厅长胡思义提议以厘金和烟酒附加税专款固定作为大学筹办基金。对此,当时军阀马联甲勉强同意。但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军费大量增加,筹备经费又被挪用。直至1928年北伐胜利,安徽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安徽大学才宣告成立。但成立后的安徽大学同样因经费缺乏而发展缓慢,甚至发生了两次因为教师薪金得不到保证的索薪风潮,迫使校长何鲁和程演生因无力筹措经费而辞职^[16]。后来,安徽大学于抗战时期解散,最基本原因也是因为李顺卿无法筹措足够的内迁经费。

(三) 受政治干扰严重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受政治影响极为严重。由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刚刚开始起步,且办高等教育是花费巨大的公共事业,

除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区域中心城市,一般省高校数量不多,大多数省仅有一所省立大学。因此,政局及政客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往往决定省立大学的生死,也就基本决定省域高等教育的生死存亡。清末安徽高等教育发展顺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898年到1911年间安徽政局基本稳定;从邓华熙到王之春、恩铭、勋诚等几任巡抚,都是以开明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对高等教育十分重视,大力支持并亲自主持高等学堂。如邓华熙两次上书,在全国率先创办省立高等学堂;王之春将求是学堂改为安徽大学堂,随后改为安徽高等学堂;恩铭和勋诚先后都支持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的改革。到民国时期,特别是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政治高度动荡,各路军阀、省长往往任期不到1年,甚至不到一个月。在这种背景下,军阀、省长只能关心自己的位置,毫无精力顾及高等教育,任何关于高校的办学计划、经费筹措都无法落实。倪嗣冲于1913年下令裁撤教育厅,降为教育科,归并为内务司下,并于1914、1916和1918年三次下令停办公办学校,将教育经费挪作军费^{[4](P371-383)}。1916年,教育部同时视察山东和安徽高等教育办理情况,发现山东省有省级教育行政人员15人,道级别以上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人员达到30人,而安徽只有省级7人,道级没有专人负责^[1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省长依然变动极为频繁,如1929年9月杨亮功到安庆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起至次年6月辞职不到一年时间里,安徽省换了6位主席,平均每人任期不到两个月^[18]。省长更换后,大学校长一般也跟着换,安徽大学从1928年到1939年间,换了9任校长,平均任期仅一年。安徽大学校长跟省长个人关系是否密切是安徽大学能否得到发展的直接因素。刘文典因为跟教育厅长关系不睦,在处理学潮时得不到教育厅和省长的支持,导致被罢免;何鲁和程演生因为得不到省长支持,无法解决教师薪金而被迫辞职;程天放因为跟时任省长陈调元关系密切而被任命为教育厅长兼安徽大学校长,顺利建成法学院和理学院,而一旦陈调元被排挤出安徽省,程天放旋即辞职。当陕西军阀刘镇华坐镇安徽,立马聘

③安徽省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在每年省财政预算层面连年增加,从1914年的18万元增加到1920年的97万元。但由于地方财政税收不能及时到账,省库不能按时支付,连年积欠,到1920年,经教育界人士多方核查,发现其中已结余的积欠经费77万元实际已经被倪嗣冲私吞。见翁飞,《安徽近代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424.

请跟自己关系密切的傅铜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傅铜不仅要到前任校长未能索要回来的政府所欠经费10万元,而且多得到6千元用于购买仪器设备。他还成功从省政府手中获得10.24万亩农田作为农学院试验场,年收益达70万元,一举扭转安徽大学办学经费短缺之困。而安徽大学1939年被解散,跟教育厅长与安徽大学的矛盾也有一定关系^[19]。

三、启示

(一) 强大的经济基础是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高等教育是耗资巨大的事业,无论校园校舍建设、聘请名师硕儒、采购科学仪器设备等一次性投资,还是维持高校正常运行的持续性投入,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需要有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做保障。明清时期以徽商为代表的安徽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富裕,能够供养大量书院及生员;清末在经过太平天国动荡后人地矛盾得到缓解,社会稳定,经济恢复迅速,省级财政充裕,所以,清末高等教育发展顺利。而到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困顿;安徽军阀混战及苛捐杂税,严重阻碍了安徽工商业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内国际战争频繁,政府无力发展生产,导致此阶段安徽经济持续凋敝,政府财政收入严重不足,无力发展高等教育,甚至发生军阀倪嗣冲下令停办所有学校、节省经费举办团练等私人武装的事情,更有教育厅长江嘯找省长索要教师薪金被殴打,安大校长何鲁、程演生无法筹到教授工资而被迫辞职等种种。试想,连学校教师工资尚且得不到保证,何谈高等教育的发展呢?

现代社会高等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花费更加巨大。从现代国际和国内高等教育地区分布来看,也很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国际上经济高度发达的美、英、法、德、日、韩等经济体,其高等教育十分发达。国内经济发展良好的京沪、江浙地区的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经济相对薄弱的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就比较缓慢。那种认为“穷国办大教育”,期望少投入多产出的想法更多的是主观良好的期望,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持,想办出优质的高等教育无异于痴人说梦。实施教育强省,科教兴国,不能停留在口号

上,最基本应落实在经济支持的层面上。只有真正长期有效、可持续地投入,保障教师能有尊严、体面地工作,高等教育才能得到良好发展。

(二) 稳定而适度的政治环境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直接决定因素

首先,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为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高等教育是见效缓慢,且花费巨大的事业,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等教育培养社会精英,提供社会需要的先进科学技术,都是进展缓慢的事业,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积累。欧美大学有如今的辉煌,与其几百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分不开。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充分认识到教育对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性,正所谓“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学政是地方政府的最核心工作之一。清末政府在各种政策中摇摆,但对于办理高等教育却坚定不移。戊戌变法唯一成果即高等教育政策,如京师大学堂以及安徽求是学堂都没有受到冲击。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仍是废科举兴学堂。清末安徽政局比较稳定,几任巡抚,从邓华熙到王之春、恩铭、勋诚和朱家宝都把发展高等学堂做为自己施政的重点,因而清末高等教育发展顺利。而北京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局高度动荡,中央政府无法约束地方,高等教育采取放任态度,导致地方高等教育发展受地方政局影响极大。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被皖派军阀控制,从1912到1928年,16年间更换省政府领导人达40多次,从1929年9月到1930年6月,安徽省长更换了6次,平均每人任期不到2个月,而安徽大学从1928到1938年10年间更换了9位校长。政治的动荡导致高等教育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执行,安徽大学筹备期长达8年,久议不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任省长和教育厅长的决议还没得到执行就下台,下任则另起炉灶,重新洗牌。

现代西方高等教育政策大多数是长期稳定的,高校校长任期很多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教育政策是现代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稳定发展的基石,也被我国建国以来的实践反复证明。

其次,政治具有的强大力量会干扰高等教育的进程,高等教育应该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政治因其具有巨大的能量,处于社会运行的核心,能直接决定社会运行中的各种活动的命运。办理高等教育所需要

的一切,从政策到资金,从校舍到人员设备,无不需政治的保障。民国时期的“教育独立”“经费独立”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近代安徽高等教育跟政府的密切联系使其发展跌宕起伏,命运多舛。因此,高等教育不能远离政治,但也不能过于靠近,应保持一定距离。高等教育需要建立一定的规则体系(如相关法律、大学章程)加以保障,使高等教育在规则保护下,相对独立运行,既能得到政治的正面支持,也能减少政治波动的负面干扰,保持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三)高等教育要密切契合社会的发展,回应社会的需求

高等教育从其诞生的一刻起,在和社会同时发展时,慢慢演化出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并以此指导其进一步发展。但“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无论是政治论还是认识论,高等教育首先是历史的、具体的存在,必然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巨大制约。高等教育一定不可陶醉于自身规律,指望可以超越或者独立于当时社会而独立发展。17~18世纪英国牛津、剑桥坚守其“高贵”的“人文主义”办学理念,甘当“象牙塔”,不屑于回应当时沸沸扬扬的工业革命对应用技术的渴求,导致其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大大落后于德法。近代安徽高等教育之所以发展曲折,其中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当时安徽高等教育并没有深刻契合当时安徽社会的发展,导致其办学如水上无根之浮萍。民国以来,安徽政局高度动荡,经济发展停滞,社会最根本的渴求是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而安徽高等教育在此进程中难以发挥力量。从私立江淮大学、公立政法专门学校到后来的省立安徽大学,学校开设的主要是政治、法律、文学等学科,其培养的人才对当时安徽政局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政法类等人文社科学生相比理科学生思想更活跃,注重学潮、思想而不注重科学技术的提升,学校以政法类学生为主,学校相对容易兴起学潮、学生运动等,使学校发展更加不顺。安徽民生最需要的农学院是在政府的强力压迫下才建立起来,工科大学只是在1947年才开始筹建,其余如商科、医科等社会急需人才则无培养机构。民国安徽高等教育犹如无根之萍,没有深深扎根社会的土壤,民众对此类高校的兴衰成败并不放在心上,军阀、政客则可借此上下其手,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当下,我国正在积极吸收西方先进制度和本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谋求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在此进程中,盲目追求西方的“制度圣经”或者固守本国传统经验都并不现实,只有立足于当下的创造性实践才有可能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径。高等教育也是如此,不顾中国的国情而追求“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不顾我们的传统而一味渴望绝对的“学术自由”,下场自是可以预料。面对世界独一无二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应主动积极适应现代化进程,在此进程中创造性地发展理论,并以此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才有可能开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只有主动适应社会发展,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沈葵.安徽历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90.
- [2] 沈葆楨,等.重修安徽通志·选举制[O].清光绪七年(1881)刊本.
- [3] 安徽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教育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8.
- [4] 陈贤忠,程艺.安徽教育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5]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覆安徽巡抚邓华熙添设学堂折[J].湘学报,1897(3):35.
- [6] 安树芬,彭诗琅.中华教育通史·第六卷[M].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1293.
- [7] 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34:308-309.
- [8] 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M].北京:开明书店,1933:13-14.
- [9] 周宁.北洋政府时期省立安徽大学的筹办与纷争[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3).
- [10] 安徽省图书馆.安徽近代教育沿革与统计资料选辑:1840-1949[M].合肥:安徽省图书馆,1986:88.
- [11]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687.
- [12] 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革命史话,上册[M].合肥:黄山书社,1987:21.
- [13] 黄传新.安徽历史系年鉴[M].合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3:371.
- [14] 皖人发起安徽大学期成会.新教育[J].1921(2):54.
- [15]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734.
- [16] 安徽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安徽师范大学校史:1928-2008[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35-38.
- [17] 杨乃康,孙鼎恒.视察山东安徽省教育总报告[J].教育公报,1916(1):8.
- [18]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M].合肥:黄山书社,2008:45.
- [19] 洪韵.督运安徽大学仪器经过[J].训练月刊,1941(1):114.

(英文摘要下转第111页)